

达拉滩农村改革第一人

文/《内蒙古日报》记者 李文明

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最南端起伏的丘陵沟壑间,一座掩映在绿树旁的小院格外引人注目。6间楼板房,墙面被白色瓷砖罩得严严实实,宽大的院子里铺设了大理石地板,收拾得干干净净。

这座院落的主人是陈绿师。他的母亲就是40多年前在全国率先进行包产到户的赵丑女。这个村子是达拉特旗树林召镇城塔村,也是原来的耳字壕人民公社康家湾村。

见到陈绿师时,他和妻子刚从玉米田里除草归来。安顿记者一行人到家中坐下,陈绿师便讲述起40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场重大变革。

“那时我只有十几岁,还在学校读书,放假回来还要帮母亲种地。”陈绿师说,赵丑女所在的康家湾村位于达拉特旗最南端,依靠着黄河的灌溉,从清朝晚期走西口以来,就是内蒙古重要

的粮食产区。40多年前,康家湾与其他地区一样,也是实行“大呼隆”生产方式:农民们每天听生产队干部的哨子上工、下工,集体劳作。除了大年三十和年初一两天不用下地干活,所有人所有的时间都被束缚在土地上。

虽然赵丑女家附近就有一片生产大队的耕地,但她每天仍然要来回走40多分钟的路,先集合,再出工。当时50多岁的赵丑女看不下去这种“光跑路,干不出活儿”的生产方式,便向队委会提出把离家最近的那片地让她种,她“每天走路的工夫就可以把那儿地给拾掇了”。

“队里当初主要是为了照顾她的年纪比较大,就答应了她的请求,把离家最近的14亩地以及两台水车、一头骡子交给了她。”时任生产大队队长的韩子义回忆说,当时包给赵丑女地是出于对她出工不方便的考虑。“这里十年九旱,地广人稀,

许多地方不成村落。赵丑女家住在后山的梁上,去集体的地头来回出工得花一个多小时时间,队里就允许她包14亩地,后来发生的事情是谁也没有想到的。”虽然已经年逾80岁,韩子义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。

康家湾村当初的决定还不能叫做“承包”,因为生产队只是将那块地的耕种任务单独交给了赵丑女。收成还是全部归集体所有,仍然按照工分计算,只是她的工分不是按出工时间计算,而是参照集体劳动耕种一亩地需要多少工时给她打分。但赵丑女却对这块“由自己种”的土地倾注了极大的热情。“我母亲种地可下了辛苦,起早贪黑侍弄庄稼。”陈绿师回忆说。

1973年的秋天,康家湾村集体劳动的地每亩只收了五百来斤,而赵丑女耕种的地粮食亩产却上了1000斤,收成翻了一倍,她一个人共

向队里上交了1万多斤粮食,大白菜、大蒜的收成满足了整个生产队的需要。“秋收后,赵丑女家的人均收入比整个生产队高出了几倍。但是,在分配劳动所得时,却发生了很大的争议。赵丑女能够多打下粮食,但是仍然参照集体劳动给她记工分,她就明显吃亏了。队里很快就商量出了一个‘以产量定工分’的办法,即以一定的产量给赵丑女定工分,如果赵丑女第二年还能超产,就把多余的产量折成工分奖励她。”韩子义说,后来,此种方式被总结为“以产定酬”。由产量而不是“出不出工”作为考核方式,进一步激发了赵丑女的生产热情。

很快,从第二年开始,赵丑女的辛勤劳动有了回报,她种的14亩地收成多,为她折算的工分多,她最后得到的粮食自然就多了起来。

1976年,一篇描写赵丑女主动“包产到户”,解决自己

吃饭问题的文章在《鄂尔多斯日报》发表,引起了轰动。当年,康家湾又率先开始实行起了“包产到组”,模式便是参照赵丑女的方式:生产队分成3个组,给每个组定产量,超产部分折算工分,再根据工分分配粮食。1978年,当人们争论不休又拿不准调的时候,康家湾村就率先实施了更彻底的包产到户。邻村赵家梁,看到康家湾村实行了包产到户,也尝试着包产到组,一年下来全社的收入翻了6倍多。那年春节,丰收了的村民们开始挨家走串喝酒庆祝。

回忆往昔,陈绿师和韩子义历历在目,如数家珍。

沿着农村改革发展的轨迹,陈绿师也享受到了改革的红利。

“1997年,国家第二轮土地承包制实施,农村土地承包期限由15年沿长至30年。从那时起,我们思想更活了,也更舍得投入了。”陈绿师

说,在“五荒”开发“谁建设、谁管护、谁受益”的政策激励下,陈绿师家又开发了几十亩水浇地,耕地总承包面积由增加到到100多亩。

2006年,农业税全面取消,农民彻底从土地包袱中解脱出来。“现在,我们不仅不用交税了,国家还给我们发粮食直补、粮种补贴、农机补贴、退耕还林还草补贴、农业保险补贴等。现在种地用机械,一百多亩地从种到收,自己也不用出多少力。”陈绿师笑着说,今年来,他家里陆续购置了拖拉机、翻地机、播种机、土豆收获机等机械设备。现在仅靠种地,陈绿的师纯收入超过十多万元。

今年60岁的他继承了母亲勤劳朴实的美德,整天闲不住。从陈绿师的住家到老院子有一公里多路程,他时常过去看看40多年前母亲承包的那片土地。今年,他盘算着在那里建设几个暖棚发展蔬菜种植。

跑好改革“接力赛”

文/《内蒙古日报》记者 李文明

◎ 微语

一位名叫赵丑女的普通村民,当初只是为了能节省来回往生产队里跑的时间,而请求生产队允许她单独耕种离家最近的一片土地,竟无意中触及了当时最急需解决的农村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问题,她的成功

又无疑给后来的农村包产到户开了先河。赵丑女在耳字壕公社激起第一朵农村改革浪花,在达拉特旗,乃至鄂尔多斯市逐步改变过去的与天斗、与地斗、与人斗的发展方式,迅速掀起一轮又一轮新的改革浪潮。

40年来,改革如同黄河的波浪,一浪接一浪。我国广

大农村地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,无数农民也大踏步跟上了时代。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吃不饱、穿不暖到现在年纯收入破十万,赵丑女一家切切实实分享了改革成果,让农民活得更有尊严,也让农民越来越有话语权。

40年前,“大包干”精神成就了“小岗梦”。如今,实现

农牧业的现代化、农村牧区的繁荣发展、农牧民的全面小康依旧是农民的期待。现

在,“塞外小岗”乃至整个内蒙古都在以这样的精神,持续推进农村改革,跑好改革

这场马拉松的接力赛,努力绘就亮丽的祖国北疆风景线。



何孟雄:从容莫负少年头

新华社长沙7月11日电(记者 陈宇箫) 湖南炎陵县中村乡龙潭瑶族村何家组,有一座黑瓦白墙的江南古宅。宅子建于晚清,全国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的何孟雄,就在这座“何家大屋”里长大。参加革命后,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

“当年小吏陷江州,今日龙江作楚囚。万里投荒阿穆尔,从容莫负少年头。”这是何孟雄一次入狱后在监狱墙壁上写下的一首诗。

何孟雄,1898年6月生,湖南炎陵人。早年在长沙求学期间,与毛泽东、蔡和森、



何孟雄(资料图片)

邓中夏等交往密切,建立了革命友谊。1919年3月,何孟雄进入北京大学学习,受《新青年》为代表的新思潮影响,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,成为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重要骨干。

1920年3月,在李大钊

的指导和帮助下,何孟雄和邓中夏、罗章龙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团体——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。同年11月,加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。

1921年7月,中国共产党成立,何孟雄是全国最早的50余名党员之一;同年冬,当选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,同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成员;1923年6月,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;1925年5月1日,任刚刚成立的京绥铁路总工

会秘书长;1926年5月,调任中共唐山地委书记;1927年4月,调到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工作,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长。

在此期间,何孟雄作为北方党组织和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成员,参与发动和领导了京绥铁路、开滦煤矿、唐山铁路机车厂、正太铁路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许多重大斗争。

大革命失败后,1927年9月,中共中央由武汉迁往

上海,何孟雄也被调往上海,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、淮安特委书记、江苏省委常委兼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、军事委员会书记等职,参与领导江苏各地党组织的恢复、发展工农运动和开展武装斗争。

1931年1月17日,因叛徒告密,何孟雄在上海被捕。在狱中,他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和崇高品格,宁死不屈,同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。

1931年2月7日,何孟雄与其他23位共产党员与革命者,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,时年33岁。

“龙华千古仰高风,壮士身亡志未穷,墙外桃花墙里血,一般鲜艳一般红。”这首诗就是为了纪念这24位革命烈士所作。炎陵县档案史志局原局长张晓建说:“何孟雄曾多次入狱,在最困难的时候对党的忠诚、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始终不变,这种精神依然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。”

为了民族复兴·英雄烈士谱